

章紹嗣 章倩礪 著

血火中的文化脊梁

血火中的文化脊梁

章绍嗣 章倩砺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火中的文化脊梁/ 章绍嗣, 章倩砺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16-08151-1

I. 血… II. ①章… ②章… III. 抗战文艺研究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717号

出品人: 袁定坤

责任部门: 鄂西分社

责任编辑: 施先稳

封面设计: 李和森

责任校对: 万山红

责任印制: 杜义平

法律顾问: 王在刚

出版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1/16

字数: 321千字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216-08151-1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张: 20.5

插页: 3

印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 <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保卫大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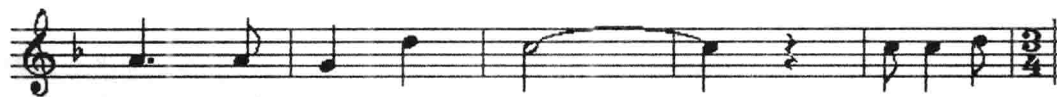
郑律成 作曲
沙旅·尔东 作词



热 血 沸 腾 在 鄱 阳， 火 花 飞 进 在



长 江， 全 国 发 出 了 爆 烈 的 吼 声，



保 卫 大 武 汉！ 武 汉 是



全 国 抗 战 的 中 心， 武 汉 是 今 日 最 大 的



都 会， 我 们 要 坚 决 地 保 卫 她，



像 西 班 牙 人 民 保 卫 马 德 里。



粉 碎 敌 人 的 进 攻， 巩 固 抗 日 的 战 线， 用 我 们 无 穷 的



威 力， 保 卫 大 武 汉！



“后福”是“厚福” “感言”代“序言”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在经历了数年与癌症拼死的搏击后，庆有余生，不能不说是“厚福”一桩。本书的出版，完全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意外。因此，我在书前写出的不是“序言”，而是生死簿中的一篇“感言”。

2006年，65岁时我正式退休，心想：从此以后可以读读爱看的书籍；整理资料，写写文章编编书，过几天舒适、闲散的日子。可是，依旧躁动的心却挡不住外界的种种诱惑，先是在学校当教学督导员，继而到教育厅任教学巡视员；后来奉令调到校庆办公室舞文弄墨、东奔西走。其间又受武汉市文史馆之托主持编写《民国时期的武汉》一书，赶辛亥百年之庆。像一颗急骤旋转的陀螺难以停止下来，工作虽没日没夜，心中却兴高采烈，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到69岁时，突然发觉到了学驾的最后期限，又死乞白赖到一家汽校学驾车，一得空就赶到场子上去“搬库倒桩”，终日累得昏天黑地。几年前的一天，刚从湘西出差回来，身感不适，到医院一查，诊断患了恶性淋巴瘤。年轻力壮的央视著名播音员罗京即因罹患此疾数月而歿。癌症呀！我如五雷轰顶，顿觉天崩地裂，第一次如此切近地感到了“死亡临头”的恐惧和绝望。

正是在我痛不欲生的时刻，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给予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来慰问的同事和朋友络绎不绝。两单位的十数名领导几乎都到家里看望过我，鼓励我与疾病斗争。我的罹难也牵动了全国校友和我教过的学生们的心，在我绝症缠身、惶惑不安而又情绪消沉的时候，远在广东84级的张昱和上海83级的路燕当即乘机飞来武汉看望；深圳81级的郭雁寄来首次治

疗的规范建议书，又两次莅汉慰问。刚从国外培训返豫的钱忠宝闻讯后，发来信一纸，词一阙，有云：“……依依惜别，楚天外，轻风摇竹。闻恶疾，瑶琴声断，登楼人独。满目不堪七月暮，举头已觉太阳毒。……愁和绪，盈尺幅，汴梁聚，何时？叹世事八九，不一而足。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入南湖。……”我捧读再三，情动衷肠，泪雨纷披。正在广西瑶山大峒密林中做调研的邵志忠得讯较迟，也借出差之机多次探望，给我送来那里的天然灵芝。已任校党委副书记的81级白江源，工作繁忙，闻悉我的病情后，先跑到医院未遇，掉头又奔到我家，其心急之状可知。王华敏、黄鲁琼、蓝取真、蓝七妹、莫祖深、陈斌、郭雄清、盘剑波……我无法一一罗列出长串姓名，各地同学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老师的关心和爱护。此情此景，令我泪如雨下，感动至极，心中深感慰藉，充满温暖。我的罹病更使亲人们痛心疾首，三位年近九旬、哺育我成人的姑妈和叔父哭泣不止；远在英国九年的儿子慨然辞去《太阳报》（华文版）主编之职，拖儿带女回国觅职，以尽人子之责；怀孕待产的女儿和焦虑不已的老伴终日侍候在侧，须臾不离。他们都在为我祈祷，期待着我战胜恶疾，重返校园。

面对如此山高水长的同志之谊、师生之情和亲情之爱，我思绪湍飞，感慨万端。最终知道：唯一可报答大家的是正视现实，调整心态，积极治疗，投入到一场与癌魔的战斗中去。

癌症的治疗是一个生不如死、脱胎换骨、极其痛苦的过程。我常常对自己说：为了爱我的亲人，为了我热爱也爱我的一群学生，为了多位情深意厚的朋友，我一定要力挺到康复的那一天。在省肿瘤医院经历了住院九个半月、漫长而规范的八次化疗和二十六次放疗后，癌细胞初步得到控制后出院。难忘啊，每天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地去进行一轮又一轮化疗与放疗，平心静气地接受命运挑战，是烙印在我心上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朋友、学生和亲人们精神上的支撑，是我年逾古稀能挺过炼狱般折磨的最强大力量。

时值秋末，出院不几日，84级的韦忠南同学陪北京的张志及、黄勤敏夫妇来家看我，志及是北京校友会负责人，30年前我的得意门生之一。他以校友的名义诚恳邀请我冬天到他创建的养生园休养度假，海南一月，让我度过了一个身心俱暖的寒冬，体力逐渐恢复。算是初步熬过了病患中最艰难、最灰暗、最

阴霾的一段日子。

2000年，我就开始了《武汉抗战文化风云录》一书的写作，已有十数篇在《长江商报》连载，连序言也请某领导写就，后终因精力有限，连载终止，出版流产。但为武汉抗战写书的心愿却一直未了。身体稍好后，便故态复萌，但重续旧篇已兴味索然，又泛起了为来汉作家写本小书的念头。一开始就遭到妻子儿女的强烈反对，但终日无所事事的百无聊赖也为他们理解，“我思故我在”，看到我在悠然写作中的快意，他们不再如“城管”强制取缔，而是强制“家管”，拟定出劳逸结合的适度方案严格执行。妻子调理营养，做好后勤保障。怕我过于劳累，早年就与我合作过的女儿也参加进来。为增强厚重的历史感，书中尽可能采用“保卫大武汉”前后、特别是当年在武汉和省内拍摄的老照片（少量例外），寻觅甚难，工作量大，四处奔波查询、搜集及整理资料的工作几乎由她一手包揽，若干篇章的探讨和写作也跻身其中，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如果没有她的参与，一年内，这本有两百多幅图片、数十万字的著作是无法完成的。

我要郑重感谢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和中南民族大学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民大党委书记陈达云研墨题签，开篇添色；市文史馆馆长吴胜家挥毫赐跋，压卷增辉。这册拙著的出版，让我在大难不死的古稀之年，终于完成了心中一个久置未了的夙愿。还要感谢诸多朋友的鼎力相助。

我想：人生在世，无论事业的成败，生活的悲欢，人情的冷暖，都如日升月落，自然而然，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努力了奋斗过，也就足够了。不必过于执着，更不能只看“完美无缺”的结果。晚年尤其珍惜过去了的岁月、友谊和亲情。数十年来，我和一批教过的学生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友情，那是我教师生涯的闪光星辉，是我极其重要的人生经历，极为珍视的精神财富。我在一首《七律·有感》的诗中写道“感天动地千行泪，呕心沥血百页书”，权以此书赠给他们，也献给我热爱的所有朋友们作一份永久的纪念。

人到了我这个岁数，才算大致经历和懂得了人生，也初步认识了自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并逐渐学会了以一种较为淡定、恬然、宽容和舒缓的方式来支配自身。珍惜今天，善待明日，是过好晚年每一天的指南。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在资深肿瘤医学专家陈焕朝先生施行的中、西医结合

调治下，我目前病情稳定，日渐康复，终于又活过来了。世界如此多彩，生活这般美好，友情那样醇厚，真想能在人世间有更长久的勾留。

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偕妻携孙，到各地走走，尽可能多地去看看我的学生、朋友和亲人们。

章绍嗣

2014年2月30日于武汉南湖畔

大武汉 让中国沸腾起来！

——武汉抗战文化浅论

(代前言)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回忆抗战初期武汉开展的活动时说：“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也带动全国沸腾起来了！”1938的武汉，写下过抗日战争时中华民族最团结、最悲壮、最艰苦卓绝、最扬眉吐气的一章。

武汉抗战文化，作为整个抗战文化运动兴起的第一个巨大潮头，汇入到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洪流，写下了新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本文旨在综述武汉抗战文化的概貌，并对其地位、特点和局限作简要的论述。

一、奔腾汹涌的文化热潮

抗战炮响，国魂震荡，民意沸腾。当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后，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如火如荼。

最先报告文坛复苏信息的，是一大批文艺刊物的创办。战事骤起，作家流散，文艺期刊纷纷停办，文艺界和出版业一度十分沉滞。不久，为数众多的刊物在武汉创刊和复办，多达200余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中如《七月》、《战地》、《抗战文艺》、《自由中国》、《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歌曲》等都是影响很大、全国瞩目的期刊。这些刊物大都坚持了抗日立场，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组织过各种专题讨论，较系统地反映了文艺界统

一战线的行动。出版事业也呈现着兴旺景象。天马书店、大路书局、长江出版社、海燕出版社、三户图书社等 50 余家出版机构先后在武汉开机，出版了数以万计的抗战书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在武汉的一年里，其分支机构由 2 个增加到 55 个，遍布全国 14 省，仅抗战通俗读物就出版了 500 余万册，成为抗战初期文化战线上一个坚强的文化宣传阵地。

文化社团的繁盛，是武汉抗战文艺运动欣欣向荣的一个突出标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大批全国性文艺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着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其影响遍及各地。1938 年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在其前后，拓荒剧社、汉口戏剧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等文艺社团相继在汉建立，其数量不下百余，他们编印刊物，组织创作，举办展览，主持演出，各展所长，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一时期，由于作家云集，期刊荟萃，社团如林，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全面展开，水到渠成。

诗歌朗诵活动首先拉开了帷幕。1937 年 10 月 19 日，诗人们首次在群众集会上，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受到热烈欢迎。在穆木天、高兰、冯乃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诗歌朗诵活动广泛展开。汉口广播电台经常演播朗诵节目，不少大型集会前都有诗歌朗诵和歌曲演唱交叉进行。车站、码头、街口等群众聚集地，戏剧演出前，也经常举行朗诵会，一些被群众称为“听的诗”，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诗歌朗诵活动的开展，使诗歌长出了激情的翅膀，从书斋、沙龙中突奔而出，成了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武器。艾青的《反侵略》、高兰的《我的家在黑龙江》、田间的《儿童节》等诗被广泛传诵，诗歌朗诵活动一度风靡江城。

戏剧活跃在江汉大地的舞台上和街巷里。1937 年底，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第二队和中国旅行剧团、中华平教会抗敌剧团等数十个剧团抵达武汉。据洪深统计，其时“全国 18 个著名戏剧团体和 95% 以上的戏剧人才”齐聚江城，各种演出，盛极一时。是年 12 月 20 日，全国戏剧界举办话剧、京剧、楚剧、评剧等剧种演出，40 多个剧团的阵容在全市几十个剧场同时摆开，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第三厅的 10 个抗敌演剧队和许多来汉的外地剧团，经常在大街小巷巡回演出，盛况空前。1938 年 4 月 11 日，“扩大宣传周”的戏剧日，12 家

戏院，10多个剧种，数十个团队轮番公演抗战剧目，昼夜不息。5月3日至9日的“兵役扩大宣传周”中，100多支戏剧、歌咏队走上街头，深入郊县，万人空巷，老少争睹，充分显示了戏剧宣传的特殊效能。电影界也不甘落后，“以电影的语汇向暴敌宣战”，在汉拍摄了3部抗日故事片和50余部纪录片，在银幕上展现了抗战画卷。

武汉抗战文艺的创作，也出现了繁丰的景象。这一时期，投入创作的人数是十分可观的。就诗歌而言，大批鼓舞抗日的诗作应运而生。高兰的朗诵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田间的战鼓擂响了时代的强音。《向太阳》、《给战斗者》、《朗诵诗选》、《为祖国而歌》等诗集，粗砺直露地宣泄着诗人狂热的激动，显示了抗战初期诗歌创作的特色。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一度覆盖了许多刊物的大块版面。特写、通讯等广义的报告文学作品数以千计，作者多达数百人。在台儿庄战役之后，短时期推出反映血战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有数十篇。其中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范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等及时而生动地报告了人们关心的战况，受到广泛的欢迎。丘东平、曹白、碧野、李辉英、谢冰莹的一些作品和大量出版的报告文学丛书，已作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载入新文学的史册。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通俗文学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大量产生。数来宝、莲花落、小曲、鼓词、顺口溜、演义故事等民间形式都被改造利用，成为宣传抗战内容的重要工具。老舍的套曲、何容的故事、冯玉祥的“丘八体”、老向的“三字经”、穆木天的大鼓词等，都是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

还需提到的是：武汉抗战文化，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洒落着世界进步作家、艺术家赤热的鲜血和辛勤的汗水。美国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新西兰作家威尔金笙，英国作家阿特丽和何登、诗人奥登、剧作家伊修伍德，日本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苏联电影艺术家罗果·贾尔曼等都曾冒着炮火硝烟踏上武汉这饱经战乱的土地，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及时向世界报导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实况，写下了不少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其中鹿地亘的大量政论、诗歌和文学论文，池田幸子的小说，绿川英子的散文，史沫特莱的通讯，斯特朗的信札等，都铭刻着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记录了那个严峻而神圣的时代，也是武汉抗战文艺中的

宝贵篇章。

总之，武汉抗战文化热潮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抗日烽火中文化界冲天而起的一枚号炮，有力地推动着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

二、不应低估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诞生，在艰难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武汉抗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革命传统，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

在中国新文化史上，曾形成过几次巨大的文学浪潮。五四文学革命，披荆斩棘，涤荡旧文学的污泥浊水，冲出了新文学的最初河床；30年代的左翼文学，摧枯拉朽，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汹涌潮流；而抗战文艺，是反帝反封建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地扩大、深入和发展。所谓抗战文艺，究其实质，决定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文学。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新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抗战初期的武汉文艺，反帝的主题十分自然地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焦点上；反对封建主义，描写国内阶级斗争的主题，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和统一战线的形成，更多地演变到反对汉奸、反对卖国投降上去。这是社会现实结构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形态上的变革。早在1936年，鲁迅就曾预言过这种必然到来的演变。他说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这总流里去。”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从思想上、组织上、创作实践上，武汉抗战文艺，是中国新文学全面地自觉地向抗战文学这一历史阶段转折的开始。抗战前的新文学，有着辉煌的业绩，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文学和群众相脱离。抗战爆发后，战争缩短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缩小了作家与人民群众的间隔，逼迫着作家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面貌。且以话剧来说，这个五四前夕从欧洲几乎是原封不动搬来的“舶来品”，

虽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有了很大进步，但话剧所表现的内容仍然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实际隔阂甚大，它的基本观众始终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职员和市民之中，走不出大城市舞台的樊篱。对于交通阻塞、文化落后的边远城镇和广大农村，说话剧不知其为何物，也不能算是过分。抗战一开始，这种封闭的状况令人惊异地改变了，禁锢话剧发展的枷锁被炮声所震落。由于广大爱国戏剧工作者的努力，大批救亡演剧队带着他们匆匆编排的剧目撤离城市，走向战地和农村。表现抗战生活的题材几乎取代了一切原有内容，形式也在发生突变，大舞台的框架和种种戏剧程式被突破和改造，街头剧、报告剧、幕表剧等小型话剧蓬勃发展。洪深在演出的实践中，看到话剧艺术在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曾兴奋地说：“话剧在这里才获得它的真正知己！”在论述抗战时期的话剧时，夏衍说：“战时的一年，真足以抵过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有了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话剧运动，在这短时期中起了一个使人刮目的突变。中国年轻的话剧，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所谓话剧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戏剧以抗战为契机，划了一个时代的阶段。”

获得长足进步的，当然不只是话剧一个门类。诗歌朗诵活动的开展，报告文学的繁兴，通俗文艺的大量涌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热烈讨论，显示了武汉抗战文艺逐渐与大众相靠拢的可喜趋向（可惜，其后不久由于政治的逆转而缓慢或中止）。老舍在谈到武汉的抗战文艺时说：“这比五四的伤感与北伐的浪漫，更朴实确切，这是与军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这将奠定了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纯真的文艺。”这评价是有见地的。正是由于时代的推动，由于文艺与群众的逐渐接近，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在抗战的怒涛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温和民主主义作家姿态步上文坛的老舍，1937 年 7 月 18 日从日寇炮火封锁下的济南来到武汉，一踏上江城这块热气腾腾的土地，就被人民高昂的抗敌热情所鼓舞，国破家亡的感受，惊觉于战火的思索，激发了他胸中的爱国热情，他开始自觉地把自已的文艺活动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全面主持“全国文协”的领导工作，毅然扛起了文艺界抗敌斗争的大旗。他自觉地、主动地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奉献给浴血奋战的军民，把它当作一个“作家”的历史职责。他说：“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假若大鼓书有用，好，我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

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当时在群众中演唱的《王小赶驴》、《张忠定计》、《忠烈图》等作品就是出自这位巨擘笔下。诗人艾青、高兰也都拂去了早期诗中忧郁、伤感的调子，发出了激昂高亢的歌唱。这一时期的作品，普遍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浸润着一种激昂而诚挚的民族感情，这正是作家们思想升华的结晶。有的作家在这里写下了他们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有的诗人从这里起步，开始他们创作的长途跋涉，因此抗战中的这段时期，成为一些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武汉抗战文化，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特别是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启承转折时期，它应该找到自己历史的位置。

三、不可忽视的特点

由于武汉抗战文化，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运动，它既不同于战前两军对垒的 30 年代文艺，也和武汉沦陷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共的其他大后方文艺不完全一样。它虽是整个抗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文化组织的统一性和文化队伍的聚散性。武汉抗战文化组织统一，阵线宽广，阵容壮观，实力雄厚。是全国文化界主要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华中重镇的一次大集中、大会师、大团结。从 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10 月，郭沫若、老舍、茅盾、田汉、洪深、阳翰笙、欧阳予倩、王平陵、何容、陈纪滢、张道藩、胡秋原、孙陵、熊佛西、胡风、范长江、穆木天、周立波、刘白羽、萧军、萧红、艾青、田间、丰子恺、张善子、冼星海、张曙、陈波儿、谢冰莹等数百名作家艺术家云集武汉，组成了“作家团结的豪华版”，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就地域而言，其主要来源有东北作家群，这批作家在东北沦陷后，饱受国破家亡之苦，辗转流浪，历尽艰辛来到武汉。他们多在 30 年代初期就已走上文学道路，抗战的烽火，更燃起他们创作的激情。在武汉，他们倡导、组织、推动了诗歌朗诵运动，同时以独特的艺术展示出东北作家悲怆、雄浑、沉健的风格，繁荣了江城的创作，是一支活跃在江汉文坛上英姿勃勃的文艺劲旅。北京天津作家群，他们目睹日寇残暴的进攻，遭受到亡

国失土的痛楚，到武汉后，他们大多投身于群众组织中，参加实地的救亡宣传工作。上海大批文艺界人士，他们大部分是有组织的戏剧、电影工作者。“八·一三”战争爆发后，13个救亡演剧队在上海成立，8月下旬，他们从上海出发，1937年底，第一、二、三、四、八、十一队先后抵达武汉，和先后到达武汉的近200个救亡团体及本地的10多个剧团一起，掀起了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高潮。与此同时，一批文艺的领袖人物、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到武汉，成为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另外还有由沦陷前的南京，随着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内迁西来武汉的文化人士和陆续从山东、陕西、河南等地来的作家，以及湖北和武汉地区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没有一个严密统一的组织，缺乏思想上的领导，尽管文艺活动的开展十分活跃，却出现着盲目和混乱，当“全国文协”和“第三厅”等组建之后，文艺界才有了较为统一的领导，抗战文艺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国文协”在武汉的成立，是五四文学革命和左联之后文艺界第一次空前广泛大团结、大联合的成功。在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里，包括了除汉奸之外，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文艺界人士，真正实现了鲁迅所期望的在抗日问题上无条件的联合。尽管在统一战线的内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一阵线的结成，有利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利于整个抗战的推进，则是毋庸置疑的。这样庞大的统一的全国性文艺团体，脱离了抗战初期“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个历史背景，则是不可能产生的。抗战初期全国文艺队伍在武汉的这次大会聚，使得被突起的战乱惊扰的作家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休整与思索，他们从战前几个中心城市的亭子间里走出，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逐渐懂得了团结的重要，逐步明确了作家的职责和文艺的作用。武汉的会聚，使他们有可能在一起交换意见，共商文艺界抗敌救亡大计，形成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使文艺界得以整编队伍，统一号令，划齐步伐，复办刊物，建立了阵地，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战文艺运动。武汉沦陷前夕会聚在江城的文艺队伍，分成四川、桂林、延安、香港等几股走向，有的深入前线，有的转移后方，有的奔赴根据地，有的潜入敌占区，将抗战文化的火种撒向四方，促进了全国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

第二，作品主题的传承性和文学风格的纪实性。抗战爆发带来了国内阶级

关系的新变动，在一个时期内，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政治形势的变化，给文艺以深刻影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是抗日斗争成为武汉文坛上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是战前左翼文学与进步文学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主题在新形势下的集中和深化。无论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以讴歌人民的抗战热情，颂扬忠勇的抗日将士，痛斥卖国的民族丑类为主旨。反帝集中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则集中到反汉奸的主题上，这是时代交付给文学的任务。战前就以善于描写中下层社会市民生活著称的小说家老舍，将他的笔触直接伸向抗日战争。1938年3月至7月，他在武汉相继发表了3个短篇和1部中篇小说。《人同此心》描写沦陷的城市，人民觉醒，团结一心，消灭入侵者。《敌与友》叙述两个有着世仇的村庄，在血的教训下，化敌为友，并肩抗日。《浴奴》刻画了一个受蹂躏的妇女，奋起反抗，手刃暴敌。中篇《蜕》是描绘五个爱国青年从事救亡宣传的故事。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走出了昔日的杂院和店铺，奔向了与敌人拼搏厮杀的疆场，喷射出民族复仇的火焰，充满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臧克家反映战地生活的诗，姚雪垠描绘农民觉醒的小说，洪深揭露汉奸资敌卖国的话剧等，都广泛地勾画了抗战中的现实生活。显示在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纪实性，它是文学服务于抗战需要的一个鲜明的历史印记，也是左翼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重要发展。人们对于战局变动的密切关注，希冀从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中获悉事态进展的心理，促成了纪实性作品的繁荣。报告文学以真实为生命自不待言，就是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也常常是以一个大众关心的事件，或一个真实的人物为基础创作而成。丘东平的许多作品使后来的研究者分不清究竟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报告，就是一个例证。武汉“四·二九”空战前后，反映空军胜利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大量涌现。艾青的《这是我们的》、臧克家的《伟大的空军》、穆木天的《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是诗的纪实；姚雪垠的《白龙港》、陶雄的《0404号机》是小说的纪实；洪深的《飞将军》是戏剧的纪实。

第三，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作品规模的小型化。战争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了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思想内容的变化，也导致了与之相适应的形式的变革与创新。由于紧急动员民众的需要，这一时期作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形式上的多样化和规模小型化。这是由作家和读者双方情绪上默契所造成